

税收经济文库

● 张路 著

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
风险控制及评价研究

中国税务出版社

税收经济文库

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及评价研究

张 路 著

中国税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及评价研究/张路著.

--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2.9

ISBN 978-7-80235-838-6

I. ①国… II. ①张… III. ①国有资产-对外投资-
风险分析-中国 IV. ①F12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3458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丛 书 名: 税收经济文库

书 名: 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及评价研究

作 者: 张 路 著

责任编辑: 黄 琳

责任校对: 于 玲

技术设计: 刘冬珂

出版发行: 中国税务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11 号(国宏大厦 B 座)

邮编: 100038

http: //www. taxation. cn

E-mail: swcb@ taxation. cn

发行中心电话: (010) 63908889/90/91

邮购直销电话: (010) 63908837 传真: (010) 6390883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94000 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35-838-6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序

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不仅使中国发展成为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且使中国发展成为全世界国有资产数额最大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国有资产倍增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亮丽的风景线。从国有资产资本化与自然资源的资本化，到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央地对接”与国有企业的整体上市，再到央企的无边界扩张与地方政府以国企为平台对民营资本进行整合，加上国企占据产业上游与资源能源及水电油气热价格不断上涨的国企行为，都在推动着国有资产倍增与国有经济比重提高。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国有资产数额最大、国有经济比重最大（简称“两大”国情）的国家，中国“两大”国情为中国国有资本的境外投资创造了物质基础与资本条件。

中国国有资本的境外投资是在人民币对外升值与人民币对内贬值的背景之下推进的，既有中国政府为了保证资源能源安全而进行的政策推动，也有国有企业尤其央企依托境外投资而更快扩张规模的业绩驱使。在国有资本的境外投资中，国有企业尤其央企成为中国境外投资的主力军。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基于规模扩张冲动而驱使的境外投资，使各种投资一开始就种下了风险的基因。这些风险的积聚及爆发不仅导致了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巨大亏损，而且也使得境外国有资产管理陷入困境。由于缺乏风险意识及境外投资前的风险评价程序，使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境外投资面临着多种风险。

一、国企境外投资集中于亚非等某些国家或地区所承受的政治社会动荡风险

国有企业尤其央企不断增长的境外投资正使其扮演跨国公司的角色。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从事境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尤其央企，跨国投资起步晚且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较弱，从而决定了进入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

难度很大。因此,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经常选择与中国地缘较近且外交关系较好的地区,投资主要集中在亚非等地区尤其是中东、西亚、非洲等地区。然而,这些地区相比于北美、欧洲等地区,大多国家存在国内经济发展落后、政府官员贪腐严重、国内居民收入悬殊、难民数量较大等问题,从而使其潜伏着政治社会动荡的风险。国有企业尤其央企的境外投资集中在这些国家,一旦投资所在国家发生政治社会动荡,往往会导致国企境外投资损失巨大。2011年上半年利比亚的国内动荡,不仅导致中国政府要动用巨大财力物力并支付巨额成本进行撤侨,而且导致国有企业的境外投资损失惨重。

二、国企境外投资的境外企业管理不适而导致的规则习俗冲突风险

长期依赖行政力量及适应国内环境的国有企业,已经形成了既定的管理思维及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思维及管理模式在国企境外投资的东道国,往往面临一个“不适应”与一个“跟不上”。一个“不适应”是指不适应东道国雇员不断要求加薪及改善待遇的要求,从而导致与工会的冲突,使国企境外投资不断遭受雇员罢工而带来的损失;一个“跟不上”,是指对东道国宗教习俗了解及尊重的跟不上,从而导致与境外投资所在地的居民形成冲突,使国企境外投资要额外支付巨大成本。在国企境外投资没有学会“管理国际化”及因地而异的“管理本土化”之前,因管理不适而导致的规则习俗冲突风险就不会化解。

三、国企境外投资过度依赖行政力量而面临的市场风险

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境外投资属于跨国竞争,更强调企业自主参与国际竞争。但是,在国内习惯了政府支持的国企,在境外投资上往往也搭政府“便车”,从国家商务部统计结果来看,国有企业尤其央企的境外投资项目除政府牵线搭桥以外,就是中国政府在非洲等地出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进行的经济援助,完全由国有企业自主寻找及选择的投资项目很少。国有企业尤其央企依赖行政力量进行境外投资,虽然容易通过审批且前期投入较少,但加大了投资风险。这种国企境外投资的模式,反映了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境外投资风险意识弱的现状。当然,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在境外投资上搭政府“便车”,往往是为了把风险转嫁给政府或让政府承担风险。

四、国企境外投资集中某些领域及种类单一所潜伏的运营风险

相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过快增长,可供国有企业选择的境外投资项目相对较少。在某种意义上,投资领域或项目的单一往往会导致投资风险级次

的递增。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并没有充分考虑这种风险。一些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往往将巨额资金投入单个项目中如资源类项目、工程类项目和劳务输出类项目，从而使运营风险更加集中。此外，在对外投资中，国有企业的前期调研过少，许多企业过度依赖对国内市场的判断和以往国内投资经验进行境外投资，从而使其无法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国有企业这种孤注一掷的境外投资行为，加上没有充分准备的投资决策，决定了其境外投资项目一旦出现风险，往往损失惨重。比较典型的例子如中国平安投资比利时富通集团，280 亿元的资金投入目前价值仅为 10 亿元左右，另外，国有企业密集在非洲地区进行的资源开采和工程项目，近几年由于一些国家的战乱也导致损失巨大。

五、国企境外投资相互压价及融资渠道单一而加剧的财务风险

国企境外投资往往还不习惯中国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支持，仍沿袭国内国企之间恶性竞争的做法。截至 2009 年底，共有 108 家央企进行境外投资，涉及境外单位 5901 户，国有企业与日俱增的对外投资不仅加剧了国际市场的竞争，而且在国有企业之间也形成了严酷的竞争。从国资委披露的相关信息看，国有企业境外投资中多次出现国企之间的恶性竞争，需要政府在其中协调；一些从事境外投资的国有企业负责人也坦言，境外投资最怕同行业内的国企挖墙脚。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相互压价，不但会影响交易标的的价格，加大投资成本，还会增加国企境外兼并收购的难度，从而加剧企业的财务风险。此外，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都与政府密不可分，向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是境外投资最常见也是最便利的融资方式。但是，单一的融资渠道加剧了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对国有银行的依赖性，使得国有企业缺乏拓宽融资渠道的动力，在国家政策进行调整或是国有银行本身出现问题而无法进一步贷款时，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就可能面临资金匮乏而导致的资金链断裂风险。

国企境外投资面临的各种风险正在逐渐爆发。如何防范并消除国企境外投资面临的各种风险，是国有资产管理的一个新课题。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的张路，深切感受到这个课题的重要性及政策意义，其博士学位论文选择并最终确定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及评价研究》这一研究方向。在张路的研究中，有价值性突破的两点在于：第一，构建多层次的境外投资风险控制流程及风险评价体系。境外投资风险的多类别、更大更复杂及可控性差，决定了有效防控投资风险不能由单个企业或单个行政

部门来完成。主张从政府、国资监管、出资公司和境外运行公司四个层面，建立宏观、中观、微观、终端层面的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控制流程及风险评价体系，要求充分发挥中国政府驻境外机构、专门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的独特作用，强调让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到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和风险评价工作中，增强了全社会的境外投资风险防范意识，更好地防范境外投资风险。第二，主张将境外投资风险评价纳入绩效评价体系中。国有企业的境外投资业务，与国有企业境内投资业务一样，都要进行绩效评价。开展境外投资业务的国有企业应将风险评价纳入到绩效评价之中，有效实现二者的对接，重视境外投资的风险防范及控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国有企业的境外投资损失。

张路的博士学位论文选择了一个几乎是没有人研究的新领域。虽然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几经波折，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这个高难度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近三年的不懈努力与刻苦钻研，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在博士学位论文稿基础上，继续补充完善而形成专著交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及评价研究》的正式出版，既标志着张路的学术研究水平达到了一定高度，也标志着张路在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管理这个政策领域有了一席之地。

国有资产管理是一个老课题，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管理是一个新课题，这个新课题仍然有许多没有解决的学术问题与政策问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张路以《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及评价研究》为平台，把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问题持续研究下去，为中国国有资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奉献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文原瑜

2012年6月28日于北京

前 言

得益于国内经济的井喷式发展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形势历经沧桑巨变：国内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3645 亿元跃升至 2011 年的 471564 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也实现了由短缺到富足的历史性转变，由 1978 年区区 1.67 亿美元飙升至 2011 年的 3.18 万亿美元，稳居世界头把交椅。经济的高速增长造就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中国经济的发展矛盾已由供给不足嬗变为供给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中国已逐步迈进“资本相对过剩”的时代。

中国近些年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主要得益于投资驱动，过度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物质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高速的经济增长无疑要有不断增加的能源资源来支撑，但随着中国能源资源的日益紧张以及国内环保压力的逐渐升级，对资源能源的迫切需要也促使国内资本迈出国门以寻找国际资源，开拓国际市场。尤其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以来，更是打开了国际市场，令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被重新确定，成为全球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而这一“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也使中国对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更加依赖。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批优秀的国内大型企业也已不再满足于国内市场，以增强国际话语权和争取国际分工链上游地位为目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意愿和动力也越发迫切。特别是由于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的同步推进以及中国连续多年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大幅增长，在降低了人民币的国内购买力和国内投资回报率的同时，也刺激并放大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冲动。可以说，在国内资本明显过剩、资源能源需求越发迫切和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意愿越发强烈的共同催化下，国有资本参与境外投资已然势不可当。

但随着国有资本境外投资步伐的逐步加快，一些亟须解决的新问题也陆续浮

出水面。无论是之前的中航油亏损事件、中国平安收购富通集团亏损事件、东航期油亏损事件、中信泰富期货投资亏损事件、中投公司海外投资亏损事件还是近些年来来的中铁建沙特亏损事件、中铁波兰亏损事件等等，亏损的字眼一次次地刺激着人们的眼球，也引起全社会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2011年3月因利比亚局势动荡给境外国有资产造成的惨重损失，更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推上风口浪尖，如此切肤之痛也让我们深切体会到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隐患已越发不容小视。一方面，当今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各种矛盾和摩擦凸显，境外投资环境变数陡增。尤其是我国境外投资区域主要集中的亚、非、拉等高风险地区，境外投资在面临政权更迭、政策朝令夕改、自然灾害肆虐等诸多不利因素时，风险自是不言而喻。同时，由于投资目的主要是为获取当地资源，如处理不谨慎，极有可能造成当地社会的不理解、反感甚至抵触，给境外投资带来消极影响，甚至是投资灾难。这也使得境外投资如履薄冰，风险隐患凸显。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内功”不足也为境外投资带来风险隐患。如有的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产权关系复杂混乱，出血点频出；有的境外投资子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舞弊导致高管携款潜逃；有的境外投资决策程序不规范，“一言堂”情况俯拾皆是；有的境外投资项目相关专业人才匮乏，经营管理水平低下；有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心竞争力匮乏，生产经营陷入瘫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显然，如何面对境外投资外部宏观环境的新变化以及我国境外投资面临的新形势，加强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防范各类投资风险，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和保值增值，保持其健康、良性发展，已成为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目前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何？存在着哪些风险？如何科学合理地防范这些风险？这些命题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重要问题。

鉴于此，本书围绕“风险控制”和“风险评价”两个核心问题，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进行深入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可以用八个字总结，即防范、监管、引导和促进。具体为：第一，更好地防范境外投资风险。这是首要目的。通过建立完善的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机制，可以在体制机制上为境外投资构建一道坚实的防火墙，而风险控制流程和风险评价体系的实施亦可以成为体制机制的有益补充，三者有机结合，可以更大限度地防范境外投资风险，确保境外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第二，更好地强化政府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监管。风险控制和评价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于政府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监管。通过构建风险控制流程，不仅能够有效地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纳入到政府的管控

范围之内,对境外投资风险进行评价,发现国有资本境外投资在风险控制中存在的缺陷,而且也可以实现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使境外投资健康地发展。第三,更好地引导企业加强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评价及控制意识。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越来越大,在委托—代理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面对境外投资纷繁复杂的内外部环境 and 诸多风险隐患,只有将风险评价体系与绩效评价体系形成联动,通过绩效考核和薪酬分配挂钩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引导企业重视境外投资的风险评价及控制工作,实现风险评价的“软约束”,而不应再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等方式对企业的境外投资进行过多干涉。第四,更好地促进企业健康良性发展。好的风险控制及评价体系不仅能够发挥风险防范、引导和监管作用,更能积极发挥促进作用,鼓励企业提高境外投资的质量。在风险评价体系不甚完善的时候,企业对境外投资存在的风险隐患考虑得并不周全,冲动投资现象时有发生,往往重数量但不重质量。特别是一些企业为了实现可能的经济效益,并不过多考虑其所可能承担的风险,置境外国有资产于巨大的风险隐患之下,降低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质量,不利于境外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一个完善的风险控制及评价体系,不仅关注境外投资的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问题,而且还能够将风险评价与绩效评价形成联动,以风险评价带动绩效评价,以绩效评价促进风险评价,彼此形成合力,更好地激励和促进企业积极参与境外投资、防范投资风险、提高投资质量,实现境外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基于上述目的,本书的研究思路及内容具体主要为:

第1~2章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该部分以境外投资历史沿革为出发点,介绍和分析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现状、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并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投资主体及主要投资方式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第3章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风险进行了归纳和深入分析。结合境外投资的实际案例,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归纳为6大方面,并对每个风险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第4章对建立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控制机制进行了详细阐述。从法律、政策、制度、措施和问责制等五个方面,由高到低逐步对如何建立完善的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控制机制提出初步构想,为之后构建风险控制流程和风险评价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5章对建立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控制流程进行了详细阐述。根据政府、国资监管部门、出资公司和境外运营公司在风险控制中的不同职责,从四个层面构建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正向、逆向风险控制流程,并通过正向与逆向的衔接,最

终形成风险控制流程的闭环，同时充分发挥驻外机构、专门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在信息采集和措施应对方面的独特作用，以期借助全社会多主体在风险控制流程中形成的合力，更好地防范境外投资风险。

第6章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指标进行设计。作为风险控制的核心问题，根据政府、国资监管部门、出资公司和境外运营公司在风险评价中的不同优势，从宏观、中观、微观和终端等四个层面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指标进行设计，为下一步构建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评价体系夯实了基础。

第7章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评价体系进行构建。从指标权数、评价标准和计分方法等方面对构建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评价体系进行了基本阐述，并通过风险预警推动四个层面风险评价的联动。最后，为使风险评价体系更富现实操作意义，同时考虑到风险控制在国有资本境外投资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将风险评价引入绩效评价”，并对如何实现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评价体系与绩效评价体系的对接进行了基本设计。

本书的核心价值主要在于：第一，对如何建立完善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机制进行了积极思考和阐述，从体制机制上为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控制流程和风险评价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考虑到国有资本境外投资因缺乏明确而详细的问责制而广受诟病，在建立完善风险控制机制时，本书也对如何构建问责制，明确有关主体的目标责任、责任监督的方式以及失职追究闭环的运行形式等进行了详细阐述。第二，构建了由政府、国资监管部门、出资公司和境外运营公司等全社会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正向和逆向风险控制流程，实现了正向风险控制流程与逆向风险控制流程的衔接，形成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控制流程的闭环，并充分发挥了驻外机构、专门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在风险控制流程中的独特作用，使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流程更具全面性、专业性和系统性。第三，基于境外投资与境内投资不尽相同的特征，从政府、国资监管部门、出资公司和境外运营公司等四个宏观、中观、微观、终端层面设计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指标，构建了由四个层面共同组成的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评价体系，并以风险预警为桥梁推动了上述四个层面风险评价的联动，使风险评价工作更富有针对性、更全面、更科学、更准确、更便于实践。第四，指出存在境外投资活动的国有出资公司应将境外投资风险评价纳入绩效评价之中，并对如何实现二者的衔接进行了简单阐述，推动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评价体系与绩效评价体系的对接，加强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评价意识，也使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完善和有效。

前 言

本书期望能在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建立健全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防范境外投资风险等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维护中国海外资产权益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但由于水平有限，本书在撰写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些舛误和不足，恳请各位专家及读者不吝斧正，以便不断修改和完善。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 路

2012 年 6 月 14 日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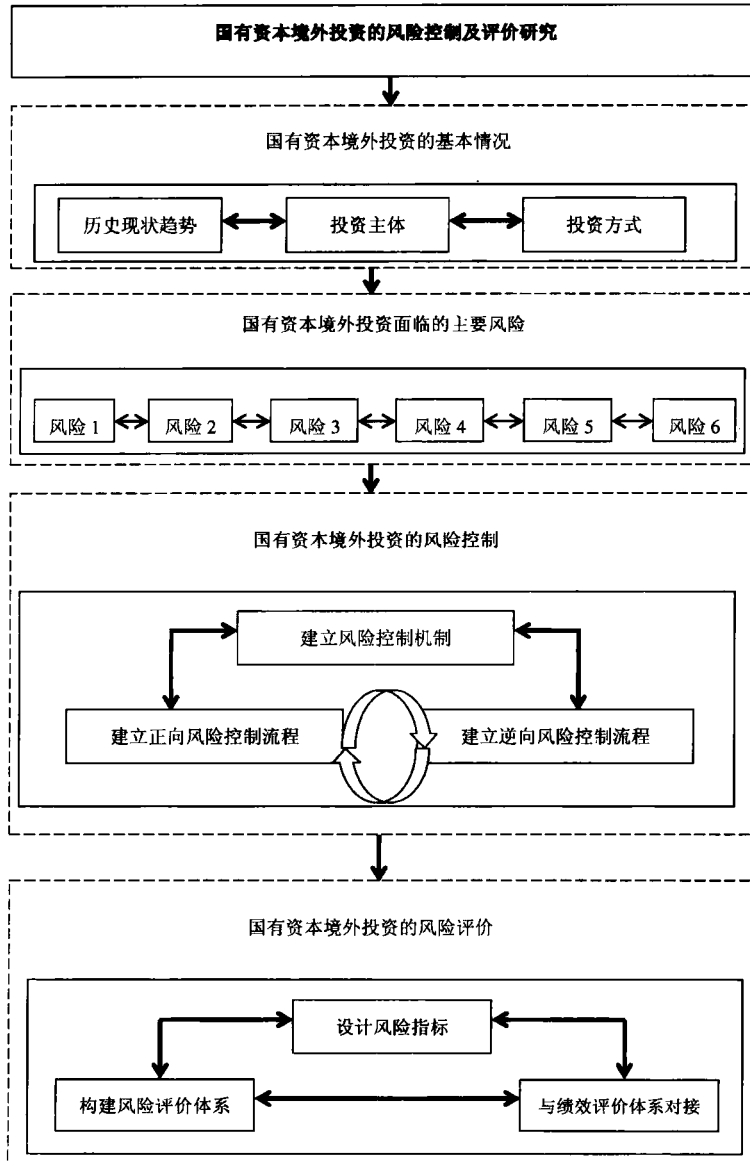


图0-1 本书的内容框架

摘 要

为进一步增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和争取国际分工链的上游地位，同时为满足“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对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的依赖和需要，近年来，中国国有资本参与境外投资的意愿越来越强烈。特别是由于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的同步推进以及中国连续多年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大幅增长，在降低了人民币的国内购买力和国内投资回报率的同时，也刺激并放大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冲动。但基于冲动而驱使的境外投资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使得境外投资从一开始便种下了风险的基因。随着国有资本境外投资规模的日益增长，境外国有资产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这些风险有的正在爆发，有的仍在继续积聚。

2011年初爆发的利比亚危机给中国在利的境外投资带来沉重打击，继而引发了全社会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重新审视，也对境外投资风险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目前国有资本境外投资存在哪些主要风险？如何科学地评价境外投资风险？如何有效防范境外投资风险？面对日益重要但风险隐患凸显的海外投资市场，这些问题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要命题，而“风险控制”及“风险评价”也就成为“防范境外投资风险”的关键研究问题所在。

受各种因素影响，境外投资风险与境内投资风险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仅风险隐患更为错综复杂，风险掌控的难度也更大，风险爆发的后果也更加严重。显然，照搬原有的针对境内投资的风险控制及风险评价的有关方法并不能有效地防范境外投资风险。面对日益复杂的境内外环境，针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及评价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应用价值。

既然防控境外投资风险不能照搬境内投资的原有方法，那么，什么样的风险控制方式才能更为全面有效地防范境外投资风险？如何构建这样一种风险控制方

式?本书认为,只有建立起国内外多主体协调联动的风险控制流程,发挥各自的信息和渠道优势,分工合作,在境外投资过程中进行风险的全程监控和跟踪,并在风险发生前及时预防,风险发生时及时应对,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及控制境外投资风险。由于境外投资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风险控制不能由单个企业或单个行政部门来完成,基于“全面性”、“有效性”以及“多主体协调联动”特征的考量,应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同步推进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工作,充分利用政府和国资监管部门的自身优势和能力,给予他们更大的责任,更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使风险控制成为他们在境外投资与境外国资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境外投资的出资公司作为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控制的第一责任人和主要责任的承担者,应成为风险控制的核心和实践主体。因此,本书从政府、国资监管部门、出资公司和境外运营公司等四个宏观、中观、微观、终端层面构建正向和逆向相结合的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控制流程,实现各个层面和各个方向风险信息的共享以及风险控制的联动,并充分发挥驻外机构、专门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的独特作用,以期发挥全社会多主体的合力,更为全面有效地防范境外投资风险。

除风险控制以外,作为风险控制的核心环节,风险评价亦不能照搬境内投资的原有方法,那么,面对不胜枚举和错综复杂的境外投资风险隐患,什么样的风险评价体系才能更为科学地评价境外投资存在的风险隐患?怎样才能构建这样一种风险评价体系?如何才能使风险评价体系真正地融入境外投资的实践中而并非流于形式?本书认为,由于境外投资风险涉及方方面面,很难依靠企业自身或单个行政部门进行科学的识别和评价,只有构建起大到宏观层面小到终端层面的全方位多层面的风险评价体系,并实现各个层面风险评价的有效联动,才能对境外投资面临的风险有更为科学和全面的认识。基于“全方位”、“多层面”特征的考量,同样应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同步推进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评价工作,使政府成为宏观层面风险评价的推动者,国资监管部门成为中观层面风险评价的主导者,出资公司和境外运营公司分别成为微观和终端层面的实践主体。因此,本书从政府、国资监管部门、出资公司和境外运营公司等四个层面设计相应的风险指标,并以此层次结构构建相应的风险评价体系。为使企业重视风险评价工作,应在拥有境外投资业务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等国有主体中实现风险评价体系与绩效评价体系的对接,将风险评价纳入到现有的绩效评价之中,形成以风险评价为核心的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绩效评价体系,并赋予风险评价更大的权数,以突出风险评价在境外投资中的重要地位,引导企业管理者在境外投资时

不仅关注经济效益，也要注重防范境外投资风险，确保境外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总体来看，本书围绕风险控制和风险评价这两个核心问题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开展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对目前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对建立完善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机制进行了基本阐述，对建立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流程、设计风险指标，构建风险评价体系提出了新的思路，丰富和发展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在风险控制和风险评价方面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控制；风险评价

Abstract

To further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o enhance their international right to speak and fight for the position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t the same time, to meet the needs of “two-out” model whose development is dependent on foreign markets and foreign resources, in recent years, the will that participate in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of the State-owned capital becomes stronger and stronger. Especially since the RMB's external appreciation and internal devaluation, the rapid and substantial increase of M2 supply in consecutive years, not only reduce domestic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yuan and the domestic investment rate of return, but also stimulate and enlarge the impulses of overseas investment by Chinese enterprises. However, based on impulse driven, there is certain blindness by overseas investment, which makes overseas investment seed down the risk gene from the outset. With the growing scale of overseas investment by State-owned capital,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risks need to face, which are breaking out, and which continue to accumulate.

The Libyan crisis broke out in early 2011 dealt a heavy blow to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which led to re-examine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of State-owned capital by the whole society, and also gave us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risks of overseas investment. What are the main risks of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of State-owned capital? How to evaluate them scientifically? How to prevent them effectively? Face to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market which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but exists lots of potential risks, these problems become a common concern of academia and practice, “risk control” and “risk assessment” have also become the key questions to prevent the risks